

※採訪報導※

## 先秦兩漢古籍文獻數據化推手 ——專訪香港中文大學何志華教授

何淑蘋、郭妍伶\*

時 間：2008 年 12 月 27 日（四）20:00-23:00

地 點：中央研究院活動中心咖啡廳

何志華教授，一九六二年十月生，廣東南海人。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博士，研究興趣包括古籍校讎學、工具書編纂。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古籍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文子著作年代新證》、《經史考據——從《詩》《書》到《史記》》、《高誘注解發微——從《呂氏春秋》到《淮南子》》三部專書，並主編《魏晉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叢刊》、《漢達古籍研究叢書》等大型工具書，長期致力於推動傳統文獻數據化工作，對世界漢學發展影響深遠。

### 一、 請問您是如何踏上國學研究之路？

這要從一九八六年談起。那年我自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畢業，系上有些老師很令人敬佩，其中一位是擔任講座教授的劉殿爵老師。我在本科時曾和現在任職於中研院文哲所的嚴志雄老師一起修讀劉教授開設的「呂氏春秋」，這門課內容比較艱深，選修的人只有我們兩個而已。修了這門課後，我開始感到自己對先秦兩漢文獻具有濃厚的興趣，再加上覺得本科所學不足，希望可以追隨老師們做進一步的研究，於是報考研究院，在一九八六年進入中文大學唸碩士班，一九八八年畢業。

---

\* 何淑蘋、郭妍伶，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我的碩士論文是研究古文字，我發現它最大的功用，是可以作為閱讀古籍的一種工具。碩論考試通過後，就決定用一年時間思考下一步，先到中學教書，教書後發覺並沒有獲得很大的滿足感。到了一九九〇年，劉殿爵教授和當時中國文化研究所的所長陳方正教授合作申請一項研究計畫，要把先秦兩漢所有的文獻輸入電腦裏，製作成大型資料庫。我之前在研究院曾修過劉教授講授的「馬氏文通」這門課，《馬氏文通》是馬建忠撰寫的一部語法書籍，他引用《論語》、《孟子》等典籍，說明某字的語法作用。劉教授上課時，常利用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編印的索引，告訴我們某字有某種語法功能，及其在古籍中約有多少用例，其中符合馬建忠講的到底有多少，實際上某字還有其他的語法功能等等。劉教授當時曾說：「可惜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後來因為二次大戰停止編輯逐字索引，所以編出來的數量有限，否則今天可以利用到的古籍索引就更多了。」這番話我一直謹記在心，對我個人影響很大。

劉教授和陳教授成功申請到這項計畫後，我曉得他希望繼續哈佛燕京學社未完成的工作，打算建立一個先秦兩漢詞彙資料庫，重編或編出更多的逐字索引。哈佛燕京學社當年是用人力一張一張抄寫書卡，我們今天不可能再採用這種傳統方式。劉教授向香港研究資助局 (RGC) 申請補助，將未經前人校改的善本古籍逐一複印，然後加上標點符號，再打字輸入電腦，接著由專人校對，最後用電腦編寫索引，這樣一套流程結束後就可以出版。我知道這項計畫意義重大，所以就申請擔任計畫研究協調員。

開始執行計畫後，我第一本負責點校的書是《戰國策》，這是西漢劉向編訂，東漢高誘注解。高誘注解過多種古書，可是迄今傳世者僅有《戰國策》、《淮南子》和《呂氏春秋》。我想反正每天都要整理、點校這些古籍，就順便做一些深入的研究工作。基於這樣的考量，便報讀博士班，選擇高誘作為研究對象。我是在一九九〇年進入博士班，一九九五年完成論文，期間仍然一直在中國文化研究所工作。一九九六年，香港即將面臨九七問題，有些老師選擇提前退休，有些老師決定移民，中文系因此出現教席空缺，我便有機會申請。經過面試後，當時的系主任鄧仕樑教授和系內資深老師蔣英豪教授都願意讓我嘗試教學工作，我必須在這裏再次感謝他們當年的支持。當談及要教授的科目「文學史專題研究」時，鄧教授還鼓勵說：「你可以選擇自己有興趣的專題來教，大學教師最重要的還是學養修為，這點我們對你是有信心的；你沒有太多教學經驗，就用時間來證明你的教學能力吧！」

我說：「我看的書很專門，數量少，不知道教學上可不可以勝任？」他說：「既然你每天都在研究先秦兩漢文獻，不妨從裏面找尋一個主題來教。」所以九六年我到中文系任教，第一次開設的課程就是西漢著名文學家，《新書》的作者——賈誼。直到現在，我都是白天在中文系教書，晚上再回到文化研究所繼續工作。

劉教授當時提出這項計畫，主要因為他準備從中文系退休，回到文化研究所，所以才有時間去指導這麼大型的計畫，它的全名是「先秦兩漢一切傳世文獻電腦化資料庫研究計畫」，要將先秦兩漢所有典籍重新點校並輸入電腦，主持人當然不能用兼職的方式，每天只到研究所兩三個小時去監督工作進度；他一定得從中文系退休，全心投入才可以。他在研究所有一間辦公室，我們每天報告進度。我遇到問題就去請教，劉教授便會為我解惑。我覺得這樣非常好，因為他一定得待在那裏，我所提出的任何問題都能夠獲得解答。那可以稱得上是我人生中最開心的一段時間，擁有很多時間來專心唸書、做研究，更何況還有一位國學大師每天為我解決學術疑難。（淑蘋：劉教授應該算是您的師父了。）對！是師父。（淑蘋：您的論文是由劉殿爵教授指導嗎？）不是，我的指導教授是鄭良樹老師。鄭老師是臺灣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王叔岷先生的學生，當時在中文系任教。他給我的影響也很大，他的《戰國策研究》、《淮南子斟理》兩部書，對《戰國策》和《淮南子》兩書相關版本做了詳細校勘。鄭老師對我的指導主要是在校勘學方面，當時他在中文系，我便請他擔任指導老師。當時我每天和劉殿爵教授在一起，他們對彼此沒有意見，這樣我就有兩個老師可以請教。校勘方面請教鄭老師，至於每天讀書遇到的問題就隨時向劉教授請益。

我從九〇年開始讀博士班，論文題目選擇做《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高誘注的校勘研究。高誘注書特別之處，在對於相同事情，譬如說提到齊桓公，就好像背誦一樣，反覆背出該人物的特點；又譬如名物訓詁，他的做法也相同。當時我的想法是，可以把《戰國策》、《呂氏春秋》和《淮南子》三書裏相同的高誘注抽出來，當作校勘材料，也就是以高注校高注。因為高誘不停背誦，重複的文句便可互校。這樣的好處有二：第一，今本《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三書高注有些訛誤脫漏的地方，可以通過互證來重新校定。第二，高誘是東漢人，他所見的書版本很早，其中一條是他在注書時背誦出一大段《左傳》，差不多有一百多個字，拿來核對今本《左傳》，會發現幾處文字不同，而這些少數字恰好是關鍵所在，足以解決許多學者解釋不了的問題。亦即《左傳》學者其實並未注

意到高誘注的價值。（淑蘋：因為一個是經部，一個是子部。）對！所以容易忽略。譬如楊樹達談到某字照道理不應如此，但他並不知道高誘記錄的就不是這樣，很多學者雖然心存懷疑，但是都沒注意到高誘注其實已存有證據了。當時我想把高誘注處理好，一方面基於工作需要，另一方面這確實能解釋諸多問題，所以就選擇了這個題目。

高誘注另一特點，就是喜歡用其他書的資料來注解《淮南子》或《呂氏春秋》，我便發現一個有趣又複雜的情況，譬如《淮南子》某句話作 A，而高誘注：「A，B 也。」但是翻查《爾雅》、《說文解字》、《小爾雅》等先秦兩漢字書，都沒有看到這種訓詁方式。後來我發現與《淮南子》相關的《文子》正寫作 B，但是《文子》作 B 跟《淮南子》作 A，兩者並無訓詁關係。我因此懷疑當時東漢人著書時，並非專門訓詁，他們知道要注解的文獻內容又在其他古籍出現過，就拿那些古籍跟自己做注的書對比一下。我們知道，鄭玄注《毛詩》常用韓《詩》，清代學者馬瑞辰的《毛氏傳箋通釋》早已提出「鄭《箋》多本韓《詩》考」，指出鄭玄是用韓《詩》異文來注解《毛詩》。後來我在王肅《孔子家語注》也發現同樣情形。

《孔子家語》中的部分文字見於《大戴禮記》或《說苑》，這些都是王肅看得到的書。我發現《孔子家語》作 A，《說苑》作 B，王肅就說：「A，B 也。」可是 A、B 卻並非同義詞或近義詞的關係，所以這種訓詁解釋就從未在傳統字書如《爾雅》、《說文》中出現過。

由於發現這種情況，我便開始研究《文子》。一九九六年出土《文子》的釋文發布後，隨即引發學界熱烈討論，召開很多會議，臺灣輔仁大學也舉辦一場規模盛大的研討會，我沒有參加那一次研討會，但之前我已於一九九二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發表了一篇論文，提出高誘依據《文子》注解《淮南子》，因為我相信高誘是看到《文子》的，因此判斷今本《文子》成書時間應在東漢以前。到了一九九八年，學界已發表很多研究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李學勤先生的論文。他發現在今本《文子》裏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是老子曰，第二種是文子問、老子曰（即文子提問、老子回答）。因為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文子是老子的學生。李先生發現，今本《文子》兼有兩種情況，而出土《文子》則僅見第二種情況。所以他提出一個看法，認為今本《文子》所有的老子曰，都是原來沒有的，因此出土的只有第二種，沒有第一種；換句話說，後人利用「老子曰」的方式，將《淮南子》內容放進《文子》裏去。我對這個假設有點懷疑。出土《文子》

竹簡有二百七十七枚，共兩千七百九十字，內容其實很少。我利用一晚上時間，將出土《文子》逐字輸入《淮南子》資料庫裏核對，理論上應該找不到，因為這些都未見於《淮南子》，但是竟然發現竹簡編號〇一九八條可以在《淮南子》裏找到，當時學者沒有發現，因為他們依據的出土《文子》釋文一開始就標點錯了；換句話說，出土《文子》與《淮南子》有相合之處，這條文獻也出現在今本《文子》段首為「老子曰」的部分，證明今本《文子》「老子曰」的內容，並非全不見於出土《文子》，也證明《淮南子》和出土《文子》並無關係這種想法仍有待商榷。

可惜這麼辛苦只找到一個例子，有些學者還不願意採信，甚至說〇一九八條是從另一部出土竹簡典籍《儒家者言》掉下來的，我常和他們爭辯。如果你說二百七十七枚竹簡中，二百七十六枚沒問題，至於解決不了的那一枚就說是從別處掉下來的，這不是不合理嗎？所以我就開始研究《文子》，一九九八年先在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發表了一篇論文叫〈出土文子新證〉，提出新的證據，後來陸續撰寫多篇文章，並結集成《文子著作年代新證》（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一書。所以是因為高誘的關係，促使我開始研究《文子》。

目前為止我總共寫了三本書，第一本就是剛才提到的《文子著作年代新證》，第二本是《經史考據——從《詩》《書》到《史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年）。近幾年來，我專門討論一些經籍文本的問題，主要用先秦兩漢一些典籍來論證經學問題，希望釐清兩漢學者當時的想法。第三本是我的博士論文，叫《高誘注解發微——從《呂氏春秋》到《淮南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年）。另外，因為一直在文化研究所工作，也編了很多工具書。最近又開始撰寫《莊子》和《荀子》方面的文章，我從事國學研究的歷程大概就是這樣子。

## 二、請談談「漢達文庫」建置的緣起和經過。

一九八九年我進入文化研究所工作，開始參與劉殿爵教授這項研究計畫。當時劉教授覺得哈佛燕京學社編的古籍索引對漢學研究幫助最大，他希望能重新做這事，所以漢達文庫規劃利用電腦，自動排版所有的古籍，成為逐字索引。你們知道當年有兩個大的學術機構在編逐字索引嗎？（淑蘋：是中法漢學研究所和哈佛燕京學社嗎？）對！一個是中法合作的，一個是哈佛燕京。我們判斷不可能再用人工方



法逐字抄成卡片，這樣也容易出錯，所以打算改用電腦，利用電腦程式自動將文獻中的每句詞語抽出來。劉教授認為困難處不在電腦，而在文獻。當時設計資料庫最厲害的，就是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的謝清俊教授，他那時已做出《二十五史》資料庫。一九八九年我到臺灣拜會謝教授，他毫不保留地分享寶貴經驗，還提醒製作古籍資料庫需要注意哪些問題，使我們獲益良多。

我很感激謝教授的幫忙，而且非常佩服，因為他預測到未來發展趨勢，認為將來的電腦操作、程式運算一定是以 PC（個人電腦）為主導。中研院開始發展《二十五史》資料庫的年代較早，當時使用的仍然是大型機器（AT&T3B 系列）。謝教授告訴我，應該考慮改用 PC，但問題是，如果設定成個人電腦，將來做出來的資料庫必須能讓個人電腦使用，如果是用 AT&T 製作，就得和中研院有某種連繫，或是由中研院授權，拷貝資料庫到自己的電腦裏做，這過程需要添置一些電腦設備才可以。（淑蘋：所以謝教授在十年前就預測到古籍資料庫應該設於人人可用的 PC 了？）他的眼光實在非常遠大，準確地預見今天個人電腦的普及程度，也成功地預測出在個人電腦的環境下程式軟體的發展規模。

而且謝教授還說，我們不需要再做《史記》、《漢書》，因為《二十五史》資料庫中已有這兩部古籍，重複部分可以轉讓給我們使用。不過，後來因為劉教授很重視文獻版本，我們採用古本《史記》和《漢書》，再參考標點本，又另外重新製作了，因此沒有使用中研院的資料庫。

所以我特別感謝兩個人，一位是謝清俊主任，另一位是劉殿爵教授，他們都很有眼光。譬如謝主任，他很準確地預測到電腦發展，還提到中文系統會越來越統一。我們記住謝主任這些話，回到香港後就參考他的意見來進行。至於劉殿爵教授，他認為選擇的典籍很重要，因為將來每個人都能製作資料庫，關鍵在於輸入文獻的不同。所以他堅持：首先，一定要用古本，就是未經後人刻意校改的版本。因為明、清的版本都是校本，而盧文弨等人校書時，覺得文句不好就改動。譬如《淮南子》有清代著名學者莊逵吉校本，莊本《淮南子》有什麼問題呢？就是他覺得不好的地方就改。劉教授覺得不可以這樣，寧可採用未經後人校改的原刻本。我們考慮很久，才決定採用《四部叢刊》本，至於個別情況會再作調整，譬如《戰國策》改用黃丕烈《士禮居叢書》本，《十三經》改用阮元《十三經注疏》本。劉教授的這個堅持，我覺得非常有眼光，因為今天《淮南子》已有林林總總的資料庫，但是利用影宋鈔本《淮南子》重新校對的，就只有香港中文大學而已。

我們確定這些原則後就開始工作。工作流程是：我找一個古本，然後加上標點符號，再比對不同版本。譬如《淮南子》用《四部叢刊》本，就是影宋鈔本，拿它當底本，將莊本、《道藏》本、劉績本（明本）都拿來。把所有不同版本的異文抄上來，這是第一步。第二步，尋找所有《淮南子》的主要校勘記，把這些成果用簡單的方式輸入電腦，譬如王叔岷教授、于大成教授的研究成果，當然我們會說明出處，絕不會掠人之美。另外，清代學者中，劉殿爵教授特別喜歡王念孫，王氏所有札記我們都輸入了。所以蒐集資料的順序，第一是版本，第二是前人的札記，第三是互見文獻。譬如《淮南子》的內容很多又重見於《文子》、《呂氏春秋》裏，就得翻開這兩部書，把情況記錄下來。

做這些工作其實很辛苦，每天上午八點多我就到文化研究所，一直工作到晚上七、八點。整天不停地標點、校勘、抄錄，但好處是，中午十二點劉教授會跟我一起吃飯，在這一個多小時裏，不管問什麼他都會回答。等於是讓我唸書，一找到問題就有大師解答，而且還有薪水可以領，所以我很喜歡這個工作。從一九八九到一九九六年，每天都是過這樣的生活，直到在中文系任教，白天教書，晚上才回研究所工作，到現在為止還是如此。（淑蘋：所以剛才提到的工作流程，主要都是由您一個人進行的？）對！劉教授負責最後校對，我做好了請他審閱。

不過，其中的《竹書紀年》情況比較特殊，後來引起學界的批評。那年我剛到中文系工作，不在研究所專職，改由另一位助理幫忙編，做得不太好，邵東方先生針對這本書提出很多意見。雖然現在網路資料庫做了修改，但是逐字索引已經出版，裏面有部分標點是錯誤的。當時的情況是，以前都由我負責，但是我到中文系任教後忙不過來，就找一些研究助理幫忙。此事與劉殿爵教授無關，邵先生在文章裏批評劉教授，這是不對的。劉教授實際上並沒有很多時間去看，一般都是由我負責的，後來交給一位研究助理，水平可能不太夠，就出現問題。至於邵先生提出的意見，我們大部分都參考了，並在「漢達文庫」中修訂過來。

我們將前人校勘、互見的文獻做好後，請劉教授看一遍。這個流程從一九八九年開始執行，劉教授看完就輸入電腦，由電腦自動編製逐字索引，不用手抄卡片。（淑蘋：有專人幫忙打字？）我們有三位專門的輸入員，還請中文系同學協助校對，不容許出錯，要是第三遍沒有發現任何錯字，做到四遍就可以，最多曾校過七遍。然後按一個鍵，讓電腦不停地編製，所有的逐字索引都是 camera ready，不用重新排版。我們不可能自己排版，因為逐字索引頁數太多，不可能每頁校對，所以

一定要利用電腦自動編輯，電腦收到資料後很快就做出來了。我們一年可以出版十四種逐字索引，就是因為交給電腦處理速度很快。（淑蘋：請問這套系統是由誰設計的？）設計師是何國杰先生。我到臺灣拜會謝清俊老師時，何先生也陪同前往，謝教授稱我們是「雙何」，一個負責文獻，一個負責電腦。

我們每年完成逐字索引，交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中有個故事可以講一下。我們將先秦兩漢的文獻編成逐字索引，總共一百零八種，數量龐大，當時沒有任何出版社願意出版。有的出版社一聽就說絕對會虧本，不願冒這個風險。牛津出版社雖然願意考慮出版，卻抱持悲觀的態度，覺得做這個沒有任何好處。後來我遇見陳原教授（1918-2004），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學專家，又擔任國家出版部部長，同時也是商務印書館資深顧問。我拿著剛編出來的《戰國策逐字索引》問他說：「您覺得這些書有用嗎？」他回答：「當然有用！我叫陳萬雄來看看。」陳先生是香港商務印書館總編輯，曾經到日本留學過，知道日本人很喜歡逐字索引這類工具書，反而覺得沒有市場問題，願意幫忙出版。我們非常高興，就將所有先秦兩漢逐字索引交給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第一步是先將每種書印四百至五百本。陳先生到日本找東京書店洽談，他們願意包銷一部分，然後再找臺灣商務印書館談，因為臺灣也重視逐字索引。這樣一來，五百本中的三百本賣到日本、臺灣和歐美，香港和國內只需賣出兩百本就可以，銷售風險減低很多。就這樣，我們每一種出版後都賣光了，又再印第二版，可見陳先生眼光準確，商務跟我們雙方都獲利。這些版稅變成我們日後出版書刊的經費，也作為支持研究中心日常運作的部分開支。

到了一九九五年，資料庫已拓展到甲骨文、金文、竹簡帛書、魏晉南北朝，這些都完成了。我們看見網路日益普遍，就將整個資料庫放到網上，成為今天的漢達文庫。要補充說明的是，在一九九二、九三年左右，我們邀請到饒宗頤教授加入，因為他是出土古文字專家，在他的支持下，開始整理甲骨文、金文、竹簡帛書的工作。另外還請了沈建華女士幫忙，她是饒教授的學生，我們很多出土文獻資料庫的基礎工作都是由她負責，因為這方面我不夠專門。沈女士工作認真，貢獻很大，今天文庫中的「金文資料庫」、「竹簡帛書文獻資料庫第一期」，都是她辛勞工作的成果。

大約在一九九八年左右，漢達文庫開始逐步上網。現在大部分的用戶是透過網路使用，而國外差不多所有重點大學都已經成為我們的用戶，包括耶魯、哈佛，歐洲



像柏林大學、劍橋大學也是。他們利用資料庫來做研究，所以我們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不過還是比不上中研院，中研院的資料庫規模是全世界最大的，擁有超過十億的字，我們的成果加起來總數大概也只有六千萬字左右，還不及中研院十分之一，所以它仍然居於領先地位。我要特別強調，今天我們真的做出一點成績來，飲水思源，謝清俊教授是我們最應感謝的人，因為有他的眼光和經驗，讓我們工作順利，否則還得浪費很多精力。因此對於謝教授的恩情，我們永誌不忘。

### 三、您參與編輯「逐字索引叢刊」，在此之前，哈佛燕京學社也曾編出一系列引得，請問您覺得這些引得有何不足處？您新編的索引又具備哪些特點？

先談談哈佛燕京學社的部分，他們的逐字索引有什麼不足呢？我們覺得有兩點：第一，採用的版本並不很講究。主持者洪業先生對於很多文獻雖然專門，但是有些他並不熟悉，通常就隨便找一本，所以某些版本其實有問題。第二，因為採用人工編輯，所以正文和索引錯誤不少，而且檢索不便，洪業先生使用自己發明的「中國字度攷」檢字方法，讀者必須記住每個字的編號，譬如某字是一〇三七九，每次得花很多時間去尋找。最重要的是並非所有古籍都做索引，而且又分成「引得」和「索引」兩種，這其中還有個故事。「引得」是譯自 *index*，而「索引」則譯自 *concordance*，兩者並不相同。（淑蘋：我們還以為是一樣的。）其實它們是不同的。洪業將 *concordance* 譯為「堪靠燈」，翻的很漂亮，音義都包括了。堪靠燈就是可堪依靠的明燈，通過這盞可靠的明燈可以找到古籍的某些字詞。「引得」就是 *index*，它是選索性的；*concordance* 是全索性，就是一本書裏所有字都可以找到，譬如而、其、也，這些只是虛字而已，但在 *concordance* 裏都可以找到這些字，只要它在書裏出現過就可以，因此特別有利於古漢語的語法研究。*index* 只有重要字詞才能找到，譬如仁、義這些字，它反映重要的哲學觀念，在 *index* 可找到，但像其、也這些字就不能找到了。*concordance* 最早用於《聖經》，The Latin Bible 是拉丁文《聖經》，是首部人類使用 *concordance* 方法來處理的典籍，至於用在中國古籍上，則是從哈佛燕京學社開始。

「引得」和「索引」本來不同，其實洪業弄得有點混亂，有的書名叫「引得」

的，反而是 concordance，譬如《論語引得》就能找到所有的字，實際上應該是 concordance。因此為了避免混亂，我們將 concordance 稱為「逐字索引」。（淑蘋：為了故意區分的緣故嗎？）對！書裏全部的字都進行檢索。不過周策縱教授覺得我們這個稱呼有四個字，比較麻煩。周教授是這方面的專家，也是劉殿爵教授的老朋友，常提供寶貴意見，他也覺得編索引很重要，非常支持我們。

我們知道哈佛燕京學社的問題在哪，所以編的時候就把這些問題解決了。因為我們利用電腦，不會有人工錯誤，而且用漢語拼音或筆劃都能找到字，讀者不必記住每個字的編號，一下子就解決哈佛燕京學社當時解決不了的問題。不過，他們能用人工做出來，真的是很了不起。我曾看過洪業有一本叫《引得說》（北平：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1932 年）的小書，提到當年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的工作人員不多，只有三十個人而已。今天用電腦做這些工作，講起來很輕鬆，但是我們應該要尊重前人，因為他們用普通人力，就已能成功編製出多種古籍索引造福學界。（淑蘋：以前學界就只有他們編的索引可以使用。）他們確實對於語法、文獻研究的幫助很大，功不可沒。

#### 四、您與朱國藩、樊善標兩位教授自一九九九年 執行「先秦兩漢一切傳世古籍互見文獻研究計 畫」，請談談申請此計畫的緣起。

我們從一九九九年執行這項計畫，原因就是剛才提到的，既然在編每本書的索引時，已經把互見文獻抄起來，換句話說，資料庫裏其實已記錄了每部典籍的互見文獻情況，可以利用它們找到先秦兩漢互見文獻基本的內容。我們看到有些書其實很重要，第一本是《孔子家語疏證》，作者是清朝學者陳士珂。當《孔子家語》內容在其他文獻重複出現時，陳士珂就把其他書重複的內容抄到《孔子家語》同一段之下，方便讀者比對。我們覺得這種書很有用，譬如看到《孔子家語》一段話，旁邊錄出來是《史記·孔子世家》，裏面有相近的內容，這樣就可以對讀，觀察王肅是怎樣改動《史記》文句的；或者兩方記錄內容有何差異，哪邊多了一點，哪邊少了一點。其他像《大戴禮記》，可以互見於《禮記》，也可以互見於《孔子家語》，或是劉向《說苑》、《新序》，賈誼《新書》，還有《淮南子》。我就想

到，要是能夠將所有典籍出現的互見文獻都找出來，編成一套「先秦兩漢互見文獻叢書」，這樣不是很好嗎？於是就擬定研究計畫，提交給香港政府研究資助局。研究資助局通常會請教專家的意見，而我相信這些支持我們的專家一定包括了中研院文哲所的學者，因為他們是文獻研究權威。

計畫通過後執行迄今已完成很多種，將來還會繼續出版。利用這些互見文獻資料彙編，翻開《呂氏春秋》會看到《淮南子》，而翻開《淮南子》可以看到《呂氏春秋》、《文子》、《說苑》、《新序》，這樣比對起來很方便。整個工作也是利用電腦來處理，過去我們先做了很多注，不過以前是字與字的關係，現在利用電腦程式自動尋找相近文句，再對比排列。接著，我和朱國藩博士、樊善標教授負責判斷這些是不是具有互見文獻的關係，同意的話就加註一個記號，弄好後就可以將書交給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 五、請您談談「漢達古籍研究叢書」。

「漢達古籍研究叢書」主要有四部分，剛才提到的「互見文獻研究計畫」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叫「先秦兩漢引用經籍計畫」，這個計畫是我跟陳雄根教授合作的，我們把先秦兩漢文獻裏引用到的經籍整理出來，其實可以發現一些原本不清楚的事。譬如，你們覺得《詩經》的哪首詩是被先秦兩漢文獻引用次數最多的呢？（淑蘋：是〈關雎〉嗎？）〈關雎〉是談愛情用的，但是並非很多場合都可以派上用場，像今天我接受你們的訪問很緊張，就不能引「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這句詩了。正確答案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小旻》）。通過這項計畫，讀者不但能知道答案，還能看看這句詩是在什麼情況下被引用的，究竟是外交官的感受，抑或是普通人的體會？這樣就可以觀察先秦兩漢是如何運用詩篇的。我覺得這項計畫還蠻有意思的。（淑蘋：如果善加利用應該能夠寫出很多文章吧？）對！我們公布這些資料，就是希望提供學界參考，讓大家都可以用來撰寫文章，而不是等我們自己寫完才公布，我們一直堅持先把資料公布、出版，自己才動手寫文章。

計畫的第一部分是「互見文獻研究資料」，第二部分是「先秦兩漢引用經籍資料」，第三部分是「唐宋類書引用先秦兩漢文獻資料」，也獲得香港研究資助局支持。我還要再強調一次，這背後肯定有中研院大力支持，因為香港政府會將問卷寄

給大學或研究中心，譬如詢問：「何志華做這項研究好不好？」所以我知道背後有中研院和其他老師的支持，才能獲得資源實踐自己的研究夢想，我們必須心懷感恩。

我們從二〇〇五年開始進行「唐宋類書引用先秦兩漢文獻資料」計畫，出版包括唐宋類書引用到的《莊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工作方式是將唐宋以來類書，包括常用的《太平御覽》、《藝文類聚》、《初學記》、《群書治要》、《冊府元龜》等，全部輸入電腦。（淑蘋：數量不是很龐大嗎？）數量多沒關係，因為只要做一次就好，然後按鍵讓電腦自動尋找。我們很佩服中研院的王叔岷教授、于大成教授，他們從事校勘的厲害之處，就是知道哪些類書裏存在著一條重要佚文，我們不太可能有老前輩這麼好的學問，也不可能耗費十年時間翻查所有類書，但是現在用電腦就能做到了。

這項計畫將類書引用到的古籍資料全部挑出來，書的出版也很順利，外界反應很好。譬如研究《莊子》，應該要看王叔岷教授的《莊子校詮》，裏面提到很多類書的引文，但是有時他覺得這條引文不重要而不講，如果利用我們的資料庫，所有的引文都看得到，可以自己去判斷。所以做這些對學術界有幫助，這是我們的第三部分工作。

計畫的第四部分是出版專書，就是剛才提到的撰寫文章。我們利用資料庫來做研究，然後將相關文章彙整後，編成論文集。我個人已經出版三本，更加希望本系研究生也能利用資料庫做出一些成果。香港學術界較重視學術論文，文章要先通過嚴格審查，發表在期刊上，至於彙編成書是另外的事。我們鼓勵研究生撰寫論文，只要有足夠數量，就能集中起來，由漢達文庫協助出版。（淑蘋：補助研究生出書？）研究生如果擁有六、七篇論文，其實一般已完成博士班研究課程，可能已進入大學教書。對於這樣的學生就支持他，讓他把所有文章集中起來出一本書，這就是漢達文庫的第四部分工作。現在出版的三本都是我自己的，希望第四本是學生的。這樣的做法有個好處，因為學術期刊本身有評審制度，獲得通過的論文水平應該都不錯，學生如果能成功累積幾篇相同主題的論文，又在具評審制度的學術期刊刊登，就可以集中起來出版。這就是利用資料庫做出個人成果的概況。

（淑蘋：有針對這個資料庫特別舉辦研討會嗎？）我們明年首次舉辦全球性的國際會議（2009年1月16-18日），訂名為「古道照顏色——先秦兩漢古籍國際學術研討會」。過去我們沒有舉辦過，主要是因為到了九〇年代後期，劉殿爵教授年

紀大了，真的從研究所退休，整個研究中心其實只剩我一個人，現在幫忙的助理都是我的學生，他們有些畢業後不喜歡教書，就請來幫忙校對、找資料。我們人手有限，沒有辦研討會的能力，但是二〇〇九年是整個研究計畫進行期滿二十週年，很值得紀念，所以決定邀請前輩學者來參加會議。他們都是我們的老朋友，包括復旦大學的裘錫圭教授、美國的安樂哲 (Roger T. Ames) 教授、挪威的何莫邪 (Christoph Harbsmeier) 教授，還有中研院文哲所的林慶彰教授。這是我們首次主辦的研討會，既是回顧過去二十年工作的好時機，也讓大家一起來討論先秦兩漢的學術問題。

## 六、二〇〇五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古籍研究中心成立，請您談談這個單位的發展概況。

這個中心在二〇〇五年成立（網址 <http://www.cuhk.edu.hk/ics/rccat/>），實際上自一九八九年執行先秦兩漢研究計畫起，到二〇〇五年已有十多年時間了。當時新任的文化研究所所長蘇芳淑女士，同時也是本校藝術系講座教授。蘇教授對我們過去的工作很認同，她來接掌研究所以前，我們還只是研究計畫而已。作為一個研究計畫，大學提供的資助有限，譬如剛才提到的類書計畫、互見文獻計畫，每年都得做一份詳細的計畫書呈給香港政府研究資助局，研資局送給全世界專家學者評審，拿到高分才撥給經費。我們通常可以獲得高分，使計畫順利執行，但是這種模式終究不夠穩定，如果能夠成立中心，經費來源就變得相對穩定了，研究中心的同仁也不必擔心拿不到經費，隨時得離開。譬如一個大學畢業生，我們訓練他編輯這些古籍資料，訓練兩年後他開始懂得方法，卻因為沒經費而被迫離開，這樣實在很可惜。

我向蘇所長提出成立中心的想法，沒想到她一口答應，還覺得我們已經做了十多年，早就應該提出這個建議了。於是我們正式成立研究中心，成為香港唯一的中國古籍研究中心。從此以後，我們獲得更多支持，現在大概有百分之六十的人手是由大學研究經費支持的，換句話說，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人需要每年聘雇，透過申請計畫的方式讓他們繼續留下來，這對我們來說已經非常好了。

另外還要感謝蔣經國基金會的支持，給予資助的金額高達港幣兩百萬左右，對我們來說是一筆龐大的數目。現在我們出版的魏晉南北朝逐字索引和相關的文獻資



料庫，都是在蔣經國基金會資助下完成的。當時因為香港政府資助不足，我們向臺灣申請，還記得當時的管理人是知名的人類學家、臺灣中研院院士李亦園先生。我要特別感謝李教授，若非獲得他的大力支持，我們的計畫可能在九十年代便得中止，因為當時香港政府提供的資助並不足夠。香港政府減少經費的那年，我們很幸運地獲得臺灣支持，等到香港政府又開始支持時，我們就不再麻煩蔣經國基金會了。

研究中心在二〇〇五年正式成立，現在百分之六十的人手固定由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所支持，同仁的工作既然獲得保障，所有事務都能繼續順利進行。出版方面交由中文大學出版社負責，我們的工作性質以研究為主，同仁們可以專心做研究，網路授權也能得到一些收入，用來更新資料內容，像是馬上就要公布一個新出金文資料庫。所以成立研究中心對漢達文庫的運作很有幫助，否則別人想合作或商量使用資料庫，只能找一個研究計畫而非研究中心，對方也會擔心我們的學術地位不高。因此能夠成立這個中心對整體發展的幫助非常大，而這首先應該要感謝蘇所長，我們很幸運能獲得她的全力支持。

（淑蘋：我想請教您一個問題，研究中心所有資料庫都會出版紙本，但有些人主張既然可以利用網路，紙本應該就不再需要了，請問您的看法如何？）這個問題很好。其實漢達文庫第一次放到網上時，我們的逐字索引還繼續在賣，當時很多人提到要環保，但是調查結果顯示，其實很多老先生真的不喜歡用電腦，而且書的好處是可以讀，逐頁翻看，而電腦則是瀏覽資料，一般人不可能長時間待在螢幕前去觀看文獻內容。所以紙本資料還是會繼續出版，而且大部分的購買者就是圖書館。能賣給世界各國圖書館，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因為圖書館保留一套，所有人都可以去館裏查找。讀者不可能常跟電腦連在一起，或他想讓眼睛舒服點，就可以到圖書館將書找出來，邊翻檢邊研究。我想這是 *the market tells everything*，要是書能很快賣光，表示市場仍有需要，如果哪天書出來卻沒人買，我們就考慮只出網路版。其實出版書籍對於我們來說現在已沒有獲利了，因為成本越來越高，出版費用龐大，所以我們支付一半的出版費，中文大學出版社負責另一半，只要能維持收支平衡就好。

還有一點，就是迄今尚未開放服務大陸學者，因為存在著種種問題。以前我們打算出平裝本，譬如《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叢刊》已出版十多年，很多圖書館都買了，我們就向商務印書館建議，可以在大陸出平裝本，但是商務印書館擔心會出

現盜版的情況，考慮到無法保護版權而反對這個提議，令我們感到很遺憾。裘錫圭先生還在北京大學任教時，有一年向學校建議購買我們的逐字索引，這套書價格將近人民幣一萬元，我們努力向商務印書館爭取折扣，但這樣也把北大中文系大部分的購書經費用光了。我們覺得這樣不太好，不能服務所有學者，但是也沒辦法，如果資料庫免費開放使用，版權便會馬上消失。譬如大陸某出版機構就將金文資料庫裏所有的圖都轉抄了，我們發出一封律師信，對方卻回應說這個版本是從某位古文字學家買來的，是那位學者過世後他的遺孀賣出的。但是我們看到原來的授權書內容裏，那位學者所寫的書只有釋文，並沒有圖，那家出版機構無法解釋為何他們的收費網頁裏可以刊載所有器物銘文的圖。這些圖是我們與中國社會科學院通過協商合作，並為社科院出版一套六冊的《殷周金文集成釋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1年），我們同時擁有書和圖的版權。那家出版機構轉抄到網路上，我們雖然通過校方的法律顧問發出警告信，卻沒有獲得合理的回應。（淑蘋：沒辦法嗎？）因為打官司得花費很多力氣，這件事只好算了。

我還是希望將來可以在保護版權的情況下，儘量用便宜的價格把全部的書在大陸出版。（淑蘋：當局對於智慧財產權的宣導還需要努力吧！）他們有些商業機構對這個觀念還沒有清楚理解。因為多數的古籍研究專家都在大陸，要怎樣把這些成果，提供給真正需要的大陸學者，是我們未來很大的挑戰。我很希望他們可以利用到這些研究成果，並且提供意見。

## 七、最後請您談談未來的工作計畫。

我們從去年開始思考將來研究路向的問題，確定了以古漢語詞彙研究為重點。過去是做「字」，現在要做「詞彙」研究。我在這十多年間看見的學術研究，很多問題其實是用詞彙來做判斷的。剛才講到《文子》研究，出土《文子》出來時，大家都相信它是先秦已存在的文獻，但後來我在檢索過程中，發現出土《文子》編號二二一二出現了「朝請」一詞，而之前發表出土《文子》論文的學者都沒有注意到，「朝請」其實是漢律，是漢朝諸侯春、秋兩季朝見天子的規矩，這就使得出土《文子》的年代上限從先秦降到西漢初年。因此，學者一直以為出土《文子》是先秦已有的典籍，其實是不能成立的，現在大部分的學者都同意，出土《文子》的年

代應是西漢初年。我們的方法就是找到具有斷代意義的詞彙，將來會利用詞彙材料進行比對，去發現一些問題。

譬如《淮南子》和《呂氏春秋》關係密切，那麼要如何證明呢？《淮南子》裏有些詞彙是我們平常沒注意到的，可能只出現在《呂氏春秋》跟《淮南子》，這樣就能證明兩者間的關係。我最近到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參加「莊子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年11月7-10日），發表一篇論文，提出荀子有些理論是源於莊周的。之前有一位《莊子》專家崔大華先生，他在《莊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中說，《荀子》裏可以找到「至人」、「彭祖」、「井蛙」三詞，在《荀子》以前它們僅見於《莊子》，證明荀子對莊子其實是熟悉的。後來我找出更多詞彙，總共十多個，都只見於《莊子》。崔先生學問很好，即使沒有電腦資料庫的幫助，他也成功找到了書證，而我利用資料庫全面檢索，得到更多的例子，所以我在論文中特別感謝他，因為是崔先生提供了寶貴的靈感。

你不妨想像一下，未來學者利用資料庫，將會是多麼方便。譬如《論語》二十篇，前面十五篇年代較早，末五篇年代較晚，大概是孔子學生記錄夫子說話。你可以選擇同一部書中不同篇章的詞彙，比對他們使用的次數；也可以選擇不同的文獻，譬如《荀子》跟《莊子》，《淮南子》跟《呂氏春秋》，《文子》跟《淮南子》，從詞彙角度來看，很快就能解決問題，產生很多新靈感，對文獻傳承關係、判斷出土文獻年代，這都是非常有用的工具。

譬如研究《莊子》，你可以知道詞彙出現的情況。著名學者劉笑敢先生曾說「道德」這個詞，應該是出現在「道」和「德」之後，他發現這些詞彙出現在外篇、雜篇和內篇的百分比不同，判斷外篇、雜篇年代比較晚，再推論雜篇和外篇哪一個更晚。劉先生當時真的是逐一抄錄，但是現在不需要了，只要進入我們的網站，選擇比對的文獻，或是選擇同一個文獻裏的不同篇章進行對比，按一個鍵，它就會告訴你哪些詞彙共同出現，哪些詞彙只出現在A不出現在B，這樣就可以產生大量的靈感。我覺得這是將來文獻研究方法很重要的一個改變。我們現在已經在做了，希望明年就能出版第一本書。以後譬如讀者只要購買《莊子詞彙資料彙編》，就可以知道《莊子》裏總共出現了多少個詞，還有它們出現在其他文獻的情況如何，十分方便。

這樣一來可以補充很多大型辭典的不足，譬如《漢語大辭典》裏很多書證並不是最早的，有些詞彙其實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現。但是你不能抱怨《漢語大辭典》不

完備，因為它已經算最好的了，它沒有收入出土資料，因為它根本沒有進行這方面的研究，但是現在我們可以，這樣對於詞彙年代的判斷也會產生新看法。

未來五年我們會將主力放在處理先秦兩漢所有文獻出現過的詞彙，預計出版很多書。我們有一個核心理念，就是絕對不將找到的資料據為己有，而最快公開的方法，就是出版書籍和放置到網路上，讓學者自由利用，這樣就能大力推動先秦兩漢文獻的研究風氣。我們將來並不打算做很大的資料庫，只想把先秦兩漢這一區塊做好，希望全世界對先秦兩漢有興趣的學者，都能透過我們提供的種種工具，獲得研究上的幫助。

我現在每天在中文系教書，也擔任行政工作，其實生活滿愉快的。（淑蘋：請問您開設什麼課程？）我在本科講《史記》、《荀子》、《莊子》、《呂氏春秋》四門課，每年開其中兩門，譬如今年講《史記》和《荀子》，明年就開《莊子》和《呂氏春秋》。博碩士班就教《文子》，因為《文子》問題複雜，所以研究院裏講這門課。白天我做行政、教學，每天見很多學生，晚上就專心做研究。未來幾年在教學方面應該沒什麼改變，也不想再開新課，研究方面就是剛才講到的詞彙，希望這項計畫可以順利完成，將來大家按一個鍵就能透過網路立即取得資料，剩下的時間便可以用在分析上。如果整個學界更有研究效率，也會取得更好的成果。我們幾個人在文化研究所的工作有限，但是資料提供給全世界的漢學研究者，就會變得很有用，能夠發揮它的最大效益。

（淑蘋：今天非常感謝教授接受訪問。您編製這麼多的資料庫和工具書，為學界提供研究的利器，可以說是功德無量。）我們很感謝各界的鼓勵，尤其對於中研院長期的支持，我們永遠心懷感激。